

学习有理

着力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吴 帅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其发展状况反映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以及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新质生产力作为包含新质态要素的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数字时代,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生产需要的新型劳动者成为生产力中的革命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今年浙江省委“新春第一会”强调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浙江是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行者与领跑者,要把全面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与技能,作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聚焦新职业,加快壮大高素养数字劳动者队伍

数据业务化、业务数据化的深入发展,推动劳动工具数字化、劳动对象服务化的转型与发展,发展出人工智能训练师、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等一批原生性的新职业;智能家居、网约服务、共享经济等新的消费业态的发展,催生了互联网营销师、网约配送员等一批替代性的职业。围绕数字语言表达、数字信息传输、数字内容生产三个维度,以及工作的工具、环境、目标、内容、过程、产出等六项指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首次标注了97个数字职业。其中,二大类(专业技术人员)54个,四大类(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37个,六大类(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5个,五大类(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1个,二大类和四大类合计占比超九成。

数字职业的发展对劳动者素养提出两方面新要求:一是提升技能水平。经济与社会学家大卫·奥托尔曾预测,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将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技能极化”现象,即低技能和高技能职位数量增加,而中间技能职位数量减少。通过对国内一些地方制造业企业的调研发现,数字化升级后企业将新增一批高技术技能岗位,“全员技工”趋势正在一些企业形成。在此背景下,加快打造高素养数字劳动者队伍,是适应新型生产方式发展的需要。二是更新职业能力。“老技能”不能适应新产业发展需要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世界经济论坛发布

的报告曾预测,到2025年全球将有50%左右的劳动者需要接受新职业培训以适应新的工作需要。无论是否直接从事与数字技术有关的工作,未来的劳动者都需要掌握基本的数字技能。欧盟“2030数字罗盘”计划提出,到2030年使至少80%的成年人具备基本的数字技能。

当前,浙江正奋力建设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强省,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力争数字经济增加值和核心产业增加值分别突破7万亿元和1.6万亿元,实现“双倍增”。为服务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浙江计划到2027年累计开展数字技能培训100万人次以上,数字高技能人才总量达25万人以上。加大转岗培训力度,推动劳动者技能更新,将为支撑构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

对标新趋势,完善构建劳动者数字素养与技能框架

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与技能,要有科学、系统的能力框架作为标准和依据。早在2021年10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就指出,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实现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2021年12月,《“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发布,将“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作为十大优先行动之首。此后,几乎每年都会下发当年度“提升工作”的目标和任务。近日,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2024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部署了6个方面17项重点任务。

浙江作为数字经济大省,在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强省迈进的过程中,要把全面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与技能作为擦亮数字经济“金名片”的关键一招。浙江省人社保厅联合省委人才办等七部门印发的《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高技能人才倍增行动方案》,从培育机制、评价体系、发展生态等方面提出18条政策措施,力争把浙江打造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数字技能人才集聚地。

早在2006年,欧盟便将数字能力作为公民终身学习能力的关键要素,其发布的《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终身学习关键能力建议》报告,将数字能力列为公民终身学习八种关键能力之一。2013年,欧盟发布“欧洲公民数字能力1.0版”(DigComp1.0),随后又于2016年、2017年和2022年先后升级发布2.0版、2.1版和2.2版。欧盟的框架包括技能、知识、态度三大模块,信息和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作、数字安全以及问题解决等5个能力域、20余项具体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8年发布《全球数字素养框架》报告提出操作、信息、交流、内容创作、安全、问题解决以及职业相关等7个领域。

综合来看,可将劳动者数字技能和素养分为通用能力、专业能力和素养能力3个层次。其中,数字通用能力是指获取数字资源、使用数字化平台以及智能化设备等的技术技能,属于通用型能力范畴,如数字接入能力、数字协作能力、数字查询能力等;数字专业能力是指组织或参与数字化、智能化生产劳动所需具备的特定职业技能,属于专业型能力范畴,如数据架构设计能力、编程代码能力、系统开发能力、平台运营能力、数字化分析和创新创造能力、系统安全维护能力、数字基础设施维护能力等;数字素养能力是指适应数字化生产方式需要的观念、态度和思维方式,属于认知型能力范畴,是从事数字化相关职业的职业素养能力,如数字思维、数字学习、数字交往以及网络安全意识等。

面向全周期,将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作为打造技能型社会的重点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关键是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全面提升劳动者数字技能与素养,为“数智时代”做好职业准备,不仅是产业发展之所需,也是人的全面发展之所向。今年浙江的“新春第一会”强调提出,实施省域技能型社会建设行动,持续塑造劳动者队伍总量势能、结构红利和素质资本的叠加优势。要将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与技能作为构建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重要内容,面向人人、面向全生命周期,完善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多种方式融合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路径。

一是将数字素养与能力培养纳入全民教育体系各阶段,推动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数字时代,劳动者的工作方式日趋多元,人力资源的流动性急剧增强,劳动者的职

业更迭也将趋于高频。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对先学习再就业、先就业再学习,还是边就业边学习的劳动者,都应当给予一视同仁的政策支持。要树立数字素养与能力的培养“从娃娃抓起”的理念,将数字职业认知、数字职业体验纳入幼儿园、中小学以及高等教育各阶段。

二是加快“学分银行”建设,推进建立数字技能领域“全纳性”人才培养评价体系。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包含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区别于传统工厂制下集中劳动的生产方式,数字时代的新就业形态使得劳动者更习惯于分布式、碎片化的学习和培训形式,这对学分或资格的流通性、可转换性提出新要求。顺应人才类型、培养序列、评价主体等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亟须加强数字职业领域人才培养评价体系的贯通。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的国家资格框架制度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将学分引入资格认证系统之中,用以衡量学习者的学习成就,有助于为学习者、培训机构和雇主提供一个兼具包容性与灵活性的资格框架,从而实现各类学习结果的及时、等值认证。

三是加强劳动者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载体建设,形成发展合力。当前我国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载体建设总体呈现“三多三少”格局:一是短期性培训多,长期系统性培养少;二是低端培训多,中端和高端专业技术技能方面的培训较少;三是“作坊式”“游击队式”的培训多,形成广泛的品牌认可的载体较少。要着力推动载体建设提质扩容,鼓励更多企业、职业(技工)院校、行业协会以及市场化培训机构等参与。尤其是要注重发挥好职业(技工)院校产教融合的优势,建设数字产业学院、数字工匠学院,有条件的院校可探索建设数字技能特色校。要将数字素养与技能作为“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建设的重点,创新开设“数字技能夜校”“数字技能微课堂”等。

四是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转岗再就业人员、退役军人、残疾人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重点群体,围绕数字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分别实施智能制造、数字农业、数字金融、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的数字素养和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行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研究设立劳动者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专项资金,同时鼓励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筹集资金设立社会化的数字职业人才发展基金,并给予有效的政策支持。

【作者为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之江会客厅

今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释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如何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上重点发力?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广东财经大学特聘教授陈雨军。

记者:2024年经济工作要怎么干?您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还要完善新型生产关系,能否具体谈一下?

陈雨军:我去年开始研究新质生产力,发现它是一个生产力的发展过程,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一种新型生产力的组织形态,其要点是通过提高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来实现。概括起来说,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以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新动能作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先进生产力。而所谓新型生产关系,就是能够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要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完善。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以进促稳”,这是对坚持稳中求进的一种路径选择,按军事术语来讲就是最好的防御是进攻。我理解这里提出的“进”,就是要以创新发展和改革开放进行重点突破,以构建新质生产力和完善新型生产关系为抓手,促进中国经济全局和长期的稳定增长,要用中国发展的确定性来对冲世界变化的不确定性。

记者:为什么说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体怎样提升?

陈雨军:一国经济增长率的提升主要表现在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通常也叫做技术进步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指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等)的投入量都保持不变时,而生产量仍能增加部分的增长率。

生产力之所以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升级换代是由技术革命的重点突破不断推动的。技术革命往往首先推动了生产工具的变革。马克思很早注意到了机器在社会大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机器表现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的、使一般生产方式发生革命的起点”。马克思还通过对“珍妮纺织机”的描述来分析技术进步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作用。后来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把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称为全要素生产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索洛提出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性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形成了通常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并把它归结为是由技术进步而产生的。

虽然现在产生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的新质生产力代表性的生产工具——数字技术,在物理形态和机理上与前面三次工业革命为代表的蒸汽机、发电机和计算机有重大差异,但它的广泛应用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得以实现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实现优化组合和形成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新动能的具体形态等方面,仍然表现为技术进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因此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途径是通过创新引领实现的。比如我们知道,数字经济发展包括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近些年,宁波舟山港在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数字化改革等转型升级工作成效尤为显著。2020年以来,宁波深化梅山港区全域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甬舟智慧码头、鼠浪湖全程智能化散货码头建设,加速构建无人驾驶水运运输体系,扩大远控及自动化设备规模,加速推进5G、数字孪生等新型基础设施应用。同时还持续推进“双碳”港口建设,提升大型机械清洁能源使用比例,完善港口岸电设施建设。这大大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发展和了新质生产力。

记者:为什么说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同时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陈雨军:在高度重视和强调生产力的同时,马克思也十分强调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他认为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既可成为新技术革命产生和生产力发展的“催生婆”和“加速器”,也可能成为新技术革命产生和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抑制器”。任何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得到生产关系的调整和社会制度的支撑。

更看到,通过深化改革完善生产关系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伟大实践的宝贵经验,是促进发展的关键一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新时期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样需要创造性运用这一宝贵经验,发挥它的独特作用。因此从理论和历史来看,完善新型生产关系是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题中应有之意。

完善新型生产关系内容广泛,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重点方面着手:

第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建立发展好全国统一大市场。这可以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转,形成支撑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条件。第二,推动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解决内循环的动能问题和外循环的质量问题。第三,进一步发展壮大民营经济。通过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提高民营企业对经济发展的预期,从而促进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发展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新场景、新业态、新服务,离不开企业家的投资意愿。所以进一步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对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重要。第四,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特别是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体系和金融支持体系,为发掘新质生产力的原始创新和市场推广提供更好成长环境。第五,进一步实施高水平开放,与世界市场进一步融合,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外联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第六,进一步改革企业管理制度。建立完善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企业科层组织体系和用工形式。

记者:您能结合实际谈谈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吗?

陈雨军:我在全国各地包括浙江调研时发现:第一是要增强信心。过去几年,有些民营企业信心预期不强,缺乏投资动力,这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一定影响。第二是做好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融合。2024年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第三是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市场经济要靠统一完善的全国大市场作为支撑,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运行。另外,企业的组织体系也需要改革,要按照高技术采用的项目制进行调整。还有一点,注意实现人才结构的合理化。产业发展的人才结构既要头部的高级人才引领,也要有腰部 and 基础人才的稳固支撑。要为研发管理人员和研发骨干等腰部人才,以及产业现场工人和工程师等基础人才,提供相关配套政策。正如浙江提出的,要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提倡“人人皆可成才、个个皆能出彩、行行皆有奔头”,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总之,在战略方向把握上要双管齐下:一是进行创新引领,形成新质生产力;二是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具体战术层面上,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围绕发展大局,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打开“思想”频道
洞察识大势关注“学习有理”
精思明至理

深化“千万工程”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唐 玉

面通过坚持党的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党建,加强班子建设、效能建设,强化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组织强大的动员能力和核心引领作用,确保各方面的改革力度和效度。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每年都出席全省“千万工程”工作现场会,明确要求凡是“千万工程”中的重大问题,地方党政“一把手”都要亲自过问,并形成了五级书记一起抓“三农”的工作机制。另一方面,在积极促进乡村公共事务发展和城乡要素流动的同时,建立健全信息沟通、诉求表达、矛盾调解等制度机制,充分调动市场、社会、农民等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沟通合作、立体联动,逐步形成了一种互动式、合作型的治理关系。这种党建引领与多元参与相结合的“一核多元”治理模式,能够在实践中有效促进形成相对均衡和稳定的社会合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有助于重塑基层秩序,实现有效治理,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千万工程”实施的20多年,是浙江农民得到实惠最多、乡村治理变化最大的时期。作为一项伟大的民生工程 and 民心工程,“千万工程”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做到为农、带农、富农,生动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成为党组织顺应民意、赢得民心的重要法宝。

“千万工程”始终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从清垃圾、清污水、清厕所、道路硬化、村庄绿化等群众“急难愁盼”处着手,用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让百姓真切地受益,获得他们的认同和支持,从而改善了干群关系,提升了治理效能。同时,“千万工程”的实施与深化,也是农民群众主体性、参与性不断提升的过程。坚持“村里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原则,把“政府想做的”和“农民想做的”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自主性,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乡村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去。这样,农民群众既是“千万工程”的受益者,也是行动者,是乡村治理的利益主体、决策主体和建设主体。“千万工程”之所以具有旺盛的、持久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其“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取向,只有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坚守群众立场,才能形成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持续性良性互动,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支持。

实现既充满活力又秩序良好的治理绩效

善治的实现,既体现为社会秩序的维系,又体现为社会活力的焕发。社会秩序的维系,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基本的稳定环境;社会活力的焕发,则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来源。乡村善治的实现,应该是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而不乱、活跃

有序的动态平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管得太死,一潭死水不行;管得太松,波涛汹涌也不行。”

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引领起步,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深化提升,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迭代升级,“千万工程”始终根据乡村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乡村实际的发展变化来丰富治理方式、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各地立足村情,以产业兴旺为抓手,不断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动力;统筹推进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等全方位工作,实现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坚持“自治为基”,保证农民的生产经营主体地位和合法权益,不断激发村民自治的积极性主动性。遵循“法治为本”,更好实现法律在维护农民权益、规范市场运行、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的规范保障作用,以法治教育引导农民遇事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注重“德治为翼”,充分发挥道德的引领规范作用,为乡村“无讼”提供传统资源、情感支持和文化认同。同时,积极打造治理平台、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公共服务等,多措并举地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既秩序良好又充满活力的治理绩效。

【作者单位: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基地、浙江省社科院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之江青年论坛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明确提出要“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是提升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基础工程。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部署推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简称“千万工程”),开启了浙江乡村跨越式发展的历程。此后,浙江持续推动“千万工程”深化提升、迭代升级,从最初单纯的农村环境整治,逐步将乡村变革的辐射范围扩散至乡村产业发展、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乡村治理理念模式变革重塑等方面。

20多年来,“千万工程”让浙江乡村实现华丽蜕变,也引领着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之路。立足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城乡协调发展,全省各地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不断建立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构建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乡村社会。实践证明,“千万工程”引领下的浙江探索,对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

构建“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

“千万工程”的实施和深化,一方